

唐  
宋  
散  
文

葛晓音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唐宋散文

葛晓音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散文 / 葛晓音著. --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7  
ISBN 978-7-5325-5828-5

I. ①唐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唐代②古典散文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宋代 IV. ①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5139号

责任编辑 方晓燕  
装帧设计 田松青  
版面制作 周爱明  
技术编辑 王建中

## 唐宋散文

葛晓音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 
上海古籍出版社  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  
(1) 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  
(2) E-mail: [guji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@guji.com.cn)  
(3) 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 
开本 850×1156 1/32  
印张 5.125 插页 2 字数 11,000  
印数 1-5,300  
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 
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325-5828-5/1·2304  
定价 15.00元

## 出版说明

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》初创于上世纪60年代初。陆续出版后，反响强烈，广受欢迎，多次重版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十年内乱，丛书只出版了十余种就被迫停顿。直至“噩梦”过后，出版业迎来了新生和繁荣，丛书也再次列入我社重点项目。期间，全国各地名家教授鼎力相助，或献谋献策，或主动承担撰稿任务，“大家作小书”，切实保证了整套丛书的质量。可以说，丛书的“涅槃重生”倾注了一代学者与出版人历劫不渝的社会责任感与学术坚守。至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丛书先后出版达80种，好评如潮，远播海外，与其姐妹编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》又80种，共同被称为“哺育了一代青年古典文学爱好者的乳汁”，至今仍为古典文学爱好者，尤其是有志于高考读研的学子们案头所常备；也因此，函询电访，希望再版者，更络绎不绝。

一套丛书能历久不衰，必有诸多因素，而关键在

于其设计特色与内在质量。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》，知识涵盖面广，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：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“作家与作品”、“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”、“诗词曲文常识”、“文学体裁概述”、“文学总集和类书简介”。前二类为经，后三类为纬。经纬交织，既纵向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轨迹，凸现了她的重点部分，更横向拓展了常规文学史著作所难以涵盖，而为治文学者必备的相关知识，如格调声律、文体特点、编辑与接受的关系等等。这在当时无疑是对数十年来重道轻文倾向的一种反拨，而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研究各种向度开拓的助力。丛书写法则有异于论著，力求内容充实，知识含金量高；持论正确，而又深入浅出；文风清通扼要，有似娓娓而谈。所引文献资料，凡难解的字词句，均作注释或今译。同时编校精到，装帧雅致，便携宜藏。这些应当是丛书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。

当前，国学基本知识越来越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之必需，为此本社决定将这套在读者心目中深深扎根的丛书再次重版，并作了部分文字修订且重新包装，让其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，为普及、传承传统文化继续发挥作用。各书中有些内容明显带有当时的局限性，为存原貌，一并保留，作为一种历史的印记，或许可以引发读者更多的研读兴趣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初盛唐散文的发展 1
- 第二章 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 15
  - 一、韩愈 18
  - 二、柳宗元 38
- 第三章 中晚唐散文的趋向 53
  - 一、中唐其他散文 53
  - 二、晚唐散文的衰落 57
  - 三、唐末小品文的光彩 63
- 第四章 宋前期散文的复兴 76
  - 一、柳开和王禹偁对五代体的变革 76
  - 二、从西昆体到太学体 81
  - 三、尹洙、范仲淹和苏舜钦 86
- 第五章 北宋六大家的散文成就 96
  - 一、欧阳修 96
  - 二、曾巩和王安石 107
  - 三、苏轼 119

四、苏洵和苏辙	134
第六章 宋代其他散文	146
一、北宋中后期散文述略	146
二、南宋散文述略	151
结束语	158

## 第一章

### 初盛唐散文的发展

中国古代散文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是五经之一，又称书经，共分虞、夏、商、周四部分。目前一致认为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》是可靠的殷商文献。此外，《周书》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，其中也有一些可信的篇章，属于誓、命、训、诰一类记言之文，文字古奥难懂，从中可以窥见上古散文的最初面貌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，兼并战争极其激烈，学术思想空前活跃。散文逐渐成熟，进入了全面兴盛的时代。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历史散文，叙述错综复杂的史事，情节布置紧张曲折，人物刻画生动逼真；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诸子散文从语录体、对话论辩体进而发展到长篇专论，百家争鸣，风格各异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言简意赅，说理透辟，气势充沛，善用比喻和寓言来



表达严密的逻辑，并以平易流畅的语言，突破了周诰殷盘古奥僵化的形式，形成了既适宜于实用，又富有文学价值的新文体。

两汉时期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综合先秦史学的成就，创造出规模宏伟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，标志着记叙散文的高度发展。西汉政论文偏重于陈述政见，本经立义。贾谊、晁错、桓宽等论政筹策都能直陈利害、切中时弊，风格浑厚朴茂。东汉班固的《汉书》继《史记》之后创立了记述精详的断代史。王符的《潜夫论》、仲长统的《昌言》、王充的《论衡》等，已是内容广博、由几十篇论文组成的专著。东汉散文出现了铺陈排偶的倾向，但还不失汉文气格朴厚的本色，所以唐宋文章家提倡古文，都以三代两汉之文作为典范。

魏晋时期，散文变得通脱清峻、自由活泼。同时出现了句式整齐、专讲对偶的骈文。到南北朝时期，崇尚文采藻饰的风气愈益盛行，除了部分历史地理类的学术著作外，散文已为骈文所取代。骈俪的形式更加精巧，不但对偶有许多类型，句式也渐渐趋向骈四俪六，并讲究平仄配合、用典、比喻、夸饰等艺术技巧。先秦两汉时期，因文学和史学、哲学、经学尚未分家，纯文学的散文还没有出现。南朝齐梁文人提出区分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章的“文笔之辨”，实际上主要是根据诗赋和其他文体的区别，来划定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界线。由于强调文学作品要

“吟咏情性”、“感荡心灵”，讲究辞藻之美，无韵的散文便被排挤到议、记、经史等少数应用文章中去，归入了“笔”的范畴。而骈文既可代替散文用于奏、表、疏、记、书、论，又可用于抒情写志、描绘景物，所以兼有“文”与“笔”的所有功能。

南北朝文章的骈俪化，以及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的趋势，遭到一些持有儒家正统文艺观的文人的反对。西魏宇文泰为革除绮靡文风，提倡复古，把苏绰模仿《尚书》所作的《大诰》定为各体文章的“准式”。隋文帝也下诏命令“公私文翰，并宜实录”，并将一个用华艳词句写文表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。随后治书御史李谔上表请求禁止“缘情”的词赋，以儒家经典作为文章的“轨模”。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终目的，是将文学纳入儒学的框架，取消诗赋骈文等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形式，甚至用《尚书》式的典诰体代替一切文章，退回到文学附属于学术的上古时代去，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文风问题。骈文非但没有衰落，反而在初盛唐进入了全盛时期，从而引起了以复兴三代两汉散文为号召的古文运动。唐宋散文正是在与骈文的反复斗争和古文自身革新的过程中，发展起来的。

从唐初到唐中叶韩柳发起古文运动之前，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高宗时期。大唐帝国建立以后，唐太宗和贞观重臣魏征等在总

结南朝几代小朝廷灭亡的教训时，认识到绮靡文风对政治的危害，要求淘汰南朝文学中淫艳放诞的内容，使文章为歌颂太平、规讽时政服务。但还没有提出变革骈文的问题。因为骈体赋颂最适宜于歌功颂德，所以凡以文才著称的大臣无不擅长这种文体。除了极少数关于修改历法、议论祭礼的奏疏以外，皇帝的诏诰、臣子的章奏、书信，绝大部分是骈文。这时魏征（580—643）首先在政论文中开始了由骈转散的变革。他的《论政事疏》、《十渐疏》、《论治道疏》、《十渐不克终疏》等奏议，学习先秦古文多用排比的结构，大量使用隔句相对的排比句式。文中或者穿插单行散句，或者打破四六对仗而改用多种句法对偶，虽然仍有不少偶句，但辞意恳切，气势雄骏，从而创造出一种半骈半散的章表体，成为唐代奏疏和政论中最常用的一种形式。除魏征以外，隋唐之际还有一位隐士王绩（585—644），写了不少言志述怀的散文。如《答冯子华处士书》、《答程道士书》、《自撰墓志铭》等，自述平生散淡的襟怀，以及隐居生活无拘无束的乐趣。只是他的散文模拟前人的痕迹过于明显，像《醉乡记》、《无心子传》，显然是模仿《庄子》；《五斗先生传》和《仲长先生传》则是模仿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。尽管如此，王绩用散文亲切自由地描写日常起居的琐事，暗中抒发不为时用的牢骚，却显示了散文用于抒写情志的趋向。

贞观（627—649）末年到唐高宗龙朔年间（661—663），文坛上又出现了以上官仪（？—664）为代表的“绮错婉媚”的上官体。这时“初唐四杰”（指初唐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、杨炯四位作家）用儒家经籍和孔子思想作为理论武器，自觉地担负起廓清这种文风的使命，但他们的文章绝大部分也是骈文。王勃（649—676）还有意用他所写的那些气势“宏伟绝人”的大赋大颂来摒斥雕刻纤微、绮靡琐碎的上官体。所以这次文风革新是骈文自身由“绮碎”变为“宏博”的一场革命，不但对散文的复兴没有促进作用，反而为讴歌圣明气象提供了一种堆满“乾坤日月”、“山河鬼神”等宏丽词藻的大型骈体赋颂，导致初盛唐骈文向着虚夸、冗长的方向发展。

第二个阶段是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。由于武后爱好文章词采，不少官员因文才藻丽而得以飞黄腾达，朝廷上下竞相追求华丽文风。讲究对偶工整、雕琢词藻的骈文几乎占领了散文的全部领域，甚至连分析案例的书判和对策，都变成了词章漂亮的骈文。另一方面，一些较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如郭元振、姚崇、宋璟、陈子昂等，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批判。他们所上的奏疏大多是散文，只就国事陈述具体意见，朴实无华，务求实用。陈子昂（661—702）主要致力于诗歌革新，但提倡朴素、反对雕饰的主张对他的散文创作也有明显

的影响。他的文章大半是采用典诰文的四言句式，文字典雅古奥，又吸取了骈文的语法和用典，这说明他也是把《尚书》中的誓命训诰看作复古的最高标准的，这种僵化的文体并没有发展前途。不过陈子昂还有一些揭露时弊，指陈朝廷得失的政论散文，写得朴实平易。例如《为乔补阙论突厥表》中有一段描写边民饥饿疲惫的悲惨情状：“磧路既长，又无好水草。羊马因此重以死尽，莫不掘野鼠、食草根，或自相食，以活喉命。”通俗明白，接近口语，在当时半骈半散的政论文中极少见。此外如《堂弟孜墓志铭》赞美他堂弟英伟耿介的气质，笔意雄俊倜傥，很有气概。这类文章确实可称韩愈的先导。

第三个阶段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（713—755）到唐德宗贞元年（785—804）前。唐玄宗早期励精图治，把返朴归淳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。他曾大力倡导复古，革除浮华文风；而复古的目的是为了“移风俗、美教化”，所以他又需要那种专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大赋大颂。于是盛唐的文坛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：一方面，骈文更加兴盛，群臣为了迎合皇帝的心理，进献了大量叙述符瑞、形容盛德的纪颂。另一方面，散文开始增多。诏诰、疏议、墓志、碑文渐由骈文转为散体。骈文散文的分工也因而趋向明朗：凡是需要歌咏赞颂的应酬文字，多用骈文；凡是务实致用的文章，多用散文。只不过这时的散文还夹杂着大量骈句，可以看作是一种过渡文体。盛唐两

位著名宰相张说、张九龄虽然进献赋颂最多，但在文体由骈转散的变化中，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张说（667—730）除一部分表奏采用骈散夹杂的形式以外，有一篇用散文写的《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》，是初盛唐时期塑造人物最完整、最传神的一篇传记。它突破了隋唐以来碑传和行状空泛称颂功德的俗套，通过典型事例的选择和生活细节的描写，记述郭元振年轻时仗义疏财、劫富济贫的侠义行为，以及显贵后仍无住宅、寄居友人之家的清贫生活。同时又穿插描写他平靖边塞的功业和受朝内小人忌害的遭遇，鲜明地再现了郭公意气纵横、磊落奇伟的个性。文中还引述郭元振上武后的《古剑歌》，以古剑冲腾的光焰烘托郭公不凡的气宇；并详细描绘了郭元振平定河西后，旌节刚到玉门关，凉州城中的男女便拥上大路、歌舞远迎的场面，以突出他在边地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。一个“威容端毅、风鬣如神”的传奇式人物因此跃然纸上。张九龄（673—740）所上的书表也大多用比较朴实明白的散文写成。有些代皇帝写的敕书亲切平易，几乎和白话差不多，如“绝域行人，不容易也”，“秋后渐冷，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”（《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》）等等。朝廷文风的转变，对一般士人也有明显的影响。如下层文人请求王公贵人推荐的干谒书启，原先都用便于炫耀文采的骈文，而李白的《与韩荆州书》、王昌龄的《上李侍郎书》等就改用散文，

直接披露胸襟，洗刷了骈文华而不实的虚浮和夸饰。又如王维（701—761）的《山中与裴迪秀才书》以散文诗般的文笔，抒写夜登华子冈，独对山中月色、林外远火和夜春钟声的感受，又以想象中的春日辋川的景色招引友人裴迪和他一起隐居，实景和虚景随思绪的变化巧妙自然地构成富于诗情画意的境界。他的《招素上人弹琴简》也是一篇隽永的散文。这些作品的出现，打破了齐梁以来书简被骈文垄断的局面。

天宝中，李华、萧颖士、贾至等文人为了称颂统治者扭转文风、复兴风雅的功绩，提出效法三代古文，使儒术和古文的复兴与大唐继承唐尧虞舜之治的盛明气象相称。安史之乱后，大唐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剧烈变化，促使文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起拯救国家命运的办法来。从肃宗到德宗贞元年间，复古思潮十分盛行。元结、独孤及、崔元翰、权德舆等人都大力主张用散文“尊经”、“载道”。他们和李华、萧颖士、贾至等人一样，认为时世的治乱取决于礼乐的兴衰，文章和音乐一样，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，关系到国家的兴亡。讴歌王道的颂声可证政治清明、天下太平，穷愁怨刺的哀音则预示世道丧乱、国运衰微。从战国到六朝，政治之所以混乱，篡夺之所以频繁，主要因为文风绮丽，怨靡之声太多。安史之乱就是因为臣子不讲忠信廉耻，所以应当以儒家的礼义道德作为统治思想的根本。而从魏晋以来儒学愈

益衰微，又是由于人们普遍好尚浮靡文风的缘故。为此他们主张用“典谟誓命训诰之书”来取代那些讲究四声八病<sup>[1]</sup>的“俪偶章句”，从改革科举入手，反对进士科根据“俪偶章句”取士，批评明经科死背经书，要求通晓儒家经典的义理。梁肃、柳冕又把他们的意见加以综合，提出了“文本于道”的主张。不过，古文运动先驱所反对的“俪偶章句”，主要是指那些“词绮靡于景物”的诗赋和骈文，再加上他们认为雅颂之音才是国家兴盛的象征，所以，冗长夸饰的骈体赋颂不但不可能遭到排斥，反而要大力提倡。同时，他们所推崇的古文的最高标准，还是典谟、训诰一类上古之书，没有意识到要发展古文，还要对古文自身进行革新，尤其要解决在文学领域内如何与骈文争夺优势的问题。由于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大多数古文运动先驱的散文成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局限。

随着复古思潮的盛行，散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。古文运动的先驱们利用书、论和文集序等体裁，写下了大量议论散文，阐发他们复兴古道、改革文风的主张。萧颖士主要生活在开元、天宝年间，他的干谒书启大多用散文，但过于冗长铺陈。李华作过几篇评论交友之道、文质关系及当代人物的散文，

---

[1] 南齐永明年间，沈约把汉字的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运用到诗歌的音律中去，提出有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八种声病应当避免。这也适用于骈文的声律。



也都比较枯燥。较有特色的是他为中央的中书、御史到地方的刺史县令等各级官吏所撰写的《厅壁记》，这些文章列举历朝曾任此职的名臣，提醒现任此职的官员以他们为楷模，牢记自己的职责，尽瘁王室，勤政恤民。其实这是用“记”这种形式写的训诰式议论文。他的名作《吊古战场文》想象秦汉以来边塞多事、战场上三军覆没的景象，写得愁惨悲凄。文中运用大量辞赋句和四言古文句穿插交错，在当时骈散相间的流行文体中可称得上是别具一格的。独孤及除了用散文写作表、议和序文以外，还有几篇山水亭阁记。这些作品一般是记述一亭一泉的掌故和地势，最后引申议论；也有一些写景的段落，如《卢郎中浔阳竹亭记》：“亭前有香草怪石，杉松罗生，密箨（xiǎo）翠竿，腊月碧鲜。风动雨下，声比箫籁。”较有幽趣。但他的文章艺术上可取之处不多。梁肃、柳冕等都只用散文撰论，只有元结在古文创作中取得了较高的成就。

元结（719—772），字次山，河南府（今河南洛阳）人。天宝进士，曾任水部员外郎、道州刺史、容管经略使等职。他的政论和文论朴质有余，文采不足，但格调高古，完全改变了当时散文大量夹杂骈句的结构，也没有典谟训诰体的气味。这些议论文有的从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的角度，探讨国家兴亡的道理，如《时化》、《世化》、《七不如七篇》等；有的深入分析唐王朝在收复两京后迟迟不能恢复安定局